

编者按 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进行研究,取得很多开创性的成果,并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促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中国元素的增加。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哪些成绩?其中,中华经典国际关系研究有何特别之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助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是否一定要突破既有的理论框架?在研究方法上应该注意什么?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信岩呈专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潘忠岐教授。潘忠岐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对外政策与战略、中美与中欧关系、中华经典国际关系等,著有:《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针锋未必相对:战略思维与中美互动的对弈逻辑》《国际政治学理论解析》等。

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

——潘忠岐教授访谈

潘忠岐 信岩呈

一、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的现状与进展

信岩呈(以下简称“信”):能否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当前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的基本状况?

潘忠岐(以下简称“潘”):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也可以称作广义的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狭义的中国古代外交研究是指用当代的“外交”概念研究中国古代不同王朝通过使节以和平方式开展的对外交往行为,涉及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不太注重的使节资质、接待礼仪、领事保护等问题,但不涉及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注重的国家间战争与冲突问题。迄今,就像很少有人能够将外交学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明确区分开来一样,^①也鲜有人能够厘清中国古代外交研究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的差异。鉴于此,这里主要从广义上讨论中国古代外交的研究状况,涵盖当代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包括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对外决策、对外交往、对外关系、对外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外交思想、外交制度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约等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在此还是使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这一比较通行的成说。

按照中国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对外关系,涉及先秦的诸侯国关系和从秦至前清的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大体遵从两条研究路径:一是史学(当然还有经学),二是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同时包括外交学)。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主要遵从史学路径,即主要从历史学视角梳理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发展历程,形成的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隶属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古代外交或对外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发展过程,因此,常常作为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方面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中国人向来有修史的优良传统,并特别强调以史为鉴,绝大部分封建王朝的正史都有专述外域及其与中国相互交往的传记。因此,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致力于研究前朝前代的外交思想、政策和实践,在继往开来的同时,推陈出新。如果按照习惯上将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节点把中国历史发展区分为“古代”和“近代”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在晚清之后便成为更为确定的研究对象。然而,由于中国国门的不守,国人对外界尤其是西方的关注渐甚于对本国历史的研究。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研究视角虽变得更为多元,但以史学视角为主流的研究传统没有改变。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从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视角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进

^① 张清敏、田田叶:《21世纪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张清敏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5期,第139—160页。

行的研究才开始真正起步,直到本世纪初国际关系学视角的相关研究才渐成格局。

新中国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依然由史学视角引领。198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该学术平台极大地推动了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发展。^①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自然也受益于此。1986年,山东大学历史系黄靖等学者在《文史哲》撰文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领域里的研究获得较快的发展,涉及的范围及所取得的成果都开始赶上并超过了西方学者,出现了季羨林、张维华、岑仲勉、章龚、朱杰勤、韩振华、马雍等富有成就的学者和学科带头人,使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他们同时也遗憾地指出:“在这一领域里,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前人的成果,大多集中在对史料的发掘整理、考证和校注方面。这些研究往往偏重于中西交通,而对于占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的对外政策的产生、实施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对中国封建国家的外交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却显得很不充分;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内在发展规律、其历史分期和各历史阶段的特点、发展趋势及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同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相互关联和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展开。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有关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较为完整的著作。”^②他们的遗憾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得到弥补。1993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维华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一书出版,并成为中外关系史学科的第一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③1996年,何茂春的《中国外交通史》出版。^④1997年,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云泉教授主编的《中西文化关系史》出版。^⑤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黎虎教授的《汉唐外交制度史》出版。^⑥该书被称作“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拓奠基之作”。^⑦此前,黎虎在《历史研究》

① 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综论: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为视角》,《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第136—145页。

② 黄靖、马小鹤、任荣康:《对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几点认识》,《文史哲》1986年第6期,第45—51、73页。

③ 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④ 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⑤ 李云泉主编:《中西文化关系史》,济南:泰山出版社1997年版。

⑥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⑦ 朱绍侯:《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评〈汉唐外交制度史〉》,《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第104—110页;朱大渭:《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拓奠基之作:〈汉唐外交制度史〉评介》,《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60—166页。

发表过《殷代外交制度初探》，也属于史学视角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①

同期，国际关系学视角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出现。该视角侧重于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进行诠释。这一新的研究路径虽然并非直接从史学路径延伸而来，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史学路径的研究成果，并与之形成互补。1987年，时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宦乡提出，应“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受此鼓舞，国际关系学界开始探索从中国古代外交思想中汲取资源的可能。外交官出身的裴默农1989年在《世界知识》上发表多篇有关春秋战争时期外交方式的文章，^②1991年在《外交学院学报》发表《张仪弱楚的欺诈外交》，1994年在《历史研究》发表《春秋外交人才的遴选》等，并于1994年出版《春秋战国外交群星》一书。^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叶自成则自觉地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外交的起源、基本概念、理论和主要特色等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阐发。他在1997年发文指出，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地缘政治的思想。^④在2001年发表的文章中，他又提出“应当对中国外交思想进行系统整理与总结”。^⑤两年后，他系统梳理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的著作《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得以出版。^⑥他的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就范式建设的角度来看，叶自成的主要贡献，是将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工具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他力主从国际体系出发，就实际的国家行为体展开外交活动研究，开了风气之先”。^⑦在他的引领下，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并在21世纪初陆续发表了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

① 黎虎：《殷代外交制度初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第36—47页。

② 裴默农：《春秋时期国际会议的位次之争》，《世界知识》1989年第10期，第26—27页；裴默农：《萧太后辱使招祸》，《世界知识》1989年第14期，第24—25页；裴默农：《诗赋外交》，《世界知识》1989年第16期，第28—29页；裴默农：《战国时秦国的反间外交》，《世界知识》1989年第18期，第30页；裴默农：《春秋战国的联姻外交》，《世界知识》1989年第21期，第7页；裴默农：《倡导“远交近攻”战略的范雎》，《世界知识》1989年第22期，第29—30页。

③ 裴默农：《春秋战国外交群星》，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④ 叶自成：《试析中国地缘政治理论和实践的特色》，《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1期，第17—20，65页。

⑤ 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研究的几点想法：〈中国外交思想史〉（第一卷）序言》，《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4期，第48—56页。

⑥ 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⑦ 朱小略：《“接着讲”与范式再造：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理论困境及其出路》，《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94—108页。

在进一步讨论这些成果前,还有必要简单提一下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学科建设问题。198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成立促成了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创立,但该学科至今还没有开设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本科专业。尽管不少高校开设了“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类课程,但大多归于历史学系,国际政治学系或外交学系开设此类课程的院校极少,目前,大概只有复旦大学开设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和南开大学开设的《中国外交哲学与对外战略》属于此类。以“中国古代外交”为题开设相关课程的高校更是少之又少。尽管外交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先后开设了外交学系,还有不少高校设立了外交学硕士专业,但从学科角度推进“中国古代外交”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还远没有提上日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了国际关系学路径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

信: 21世纪以来,您认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哪些成绩?

潘: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是一个跨学科课题,从史学(及经学)视角进行研究的成果早已有之且非常丰富。^① 中国学术界从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视角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研究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形成良好开局,开创性成果主要涉及三个层面:对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系统梳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理论创新,以及在回溯中国国家形成的历史和比较东西国际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建构。

在第一个层面上,系统梳理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主要成果当首推叶自成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该书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外交思想和策略进行了开拓性的梳理,归纳并总结出以管仲为代表的“霸权学派”、以孔孟为代表的“仁义学派”、以老庄为代表的“自然秩序学派”、以文仲和范蠡为代表的“超限制外交学派”、以苏秦和张仪为代表的“谋略学派”以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权力学派”。叶自成在和王日华合作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对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的分类需要运用当代国际政治学的通用话语,把中国外交思想纳入到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知识谱系内来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外交思想学派的实质,与西方近现代出现的理

^① 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许纪霖、刘擎主编:《新天下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奉林、魏楚雄主编:《东方外交史之发展》,澳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相关文献梳理,参见朱小略:《中国古代外交导论》,上海远东出版社2021年版。杨昕沫:《中国视野: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兴起与变迁(2006—2016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20—127页。赵思洋:《民国学人对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政治思想的诠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26—45页。

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体现了从春秋到战国的外交演变,因此,“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按照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知识体系的通用术语来进行分类整理应该是可行的”。^①

同样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是阎学通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分析。2009年,他提出对先秦思想家有关国家间政治的思想可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从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两种类型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他看来,先秦思想家的著作分别从人的本性、思想观念及制度规范三个角度分析战争根源,并分别从统一天下、建立制度规范及建构新观念的角度提出实现和平和维持国家间秩序的设想。因此,他强调:“先秦思想家对于国家间关系的认识有诸多学派,理解不同派别间的分歧与共识有助于我们借鉴他们的思想来丰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② 阎学通尽管并不看好“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③但也不否认可以“借鉴先秦思想创新国际关系理论”。他强调,应该“在结合先秦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创建新理论,而不是以先秦思想为基础创建新理论以取代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④ 同期,阎学通和徐进编写的《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⑤为学界更好地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对先秦诸子国家间政治思想进行梳理和阐发的成果不断涌现。^⑥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何新华老师从外交格局、外交思想、外交制度和外交政策四个方面,对中国历代王朝的外交活动进行了非常翔实的历史学梳理;^⑦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袁南生大使以其外交官的视角,通过历史学与外交学的结合,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重大外交事件、外交制度、外交思想、外交谋略、外交人物等,并总结归纳了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规律,^⑧这同样为学界深入研究中国

① 叶自成、王日华:《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第113—132页。

② 阎学通:《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87—108页。

③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1页。

④ 阎学通:《借鉴先秦思想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第150—165、173页。

⑤ 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2008年版。

⑥ 如王日华:《〈管子〉的霸权思想及其现代化:兼与西方霸权理论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35—41页。孙学峰、杨子潇:《韩非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2期,第81—97页。刘江永:《〈管子〉国家间政治思想初探》,《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第36—56页。王日华:《孔子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5期,第47—54页。徐进:《孟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及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6—16页。金正昆、陈斐斐:《孔子外交思想的当代研究》,《国际观察》2020年第1期,第108—118页。王庆新:《儒家王道理想、天下主义与现代国际秩序的未来》,《外交评论》2016年第3期,第73—99页。

⑦ 何新华:《中国外交史(从夏至清)》,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年版。

⑧ 袁南生:《中国古代外交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版。

古代外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而且,他们两位同年出版的《中国外交史》和《中国古代外交史》将史学视角和国际关系学视角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第二个层面上,中国学者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论创新。例如,秦亚青通过提炼儒家文化体与实践体,与西方理性主义形成对照,提出以“关系性”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阐述社会性关系在建构国际规范与国家身份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① 阎学通不仅提出独特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②还从中国历史和哲学中汲取经验,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中华逻辑来解释国际体系变迁,提出“领导力”概念以解释大国的崛起和衰落。^③ 此外,赵汀阳提出应以“天下体系”为解决国际问题的世界制度;^④王逸舟提出“创造性介入”的概念,并认为应将“仁”的社会和“智”的外交更好地融合起来;^⑤叶自成提出“柔实力”的概念和“华夏主义”的国际关系范式;^⑥胡守钧、金应忠、苏长和、任晓等提出“国际共生论”和建设“共生型国际体系”的构想;^⑦余潇枫等提出以“和合主义”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⑧ 同样,从礼法关系、王霸关系、义利关系等角度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⑨ 这些理论成果的学术价值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在阿米塔·阿查亚(Ami-

① Yaqing Qin,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② Xuetong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③ Xuetong Yan,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④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Tingyang Zhao, *All Under Heaven: The Tianxia System for a Possible World Ord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1.

⑤ 王逸舟:《仁智大国:“创造性介入”概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⑥ 叶自成:《说柔、用柔、柔实力》,《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118—129页。

⑦ 胡守钧:《国际共生论》,《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35—42页;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12—21页;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20—50页;任晓:《论国际共生的价值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4—28页。

⑧ 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49—76页。

⑨ 陈康令:《礼和天下:传统东亚秩序的长稳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武心波:《王霸之辩与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4期,第100—109页;王日华:《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及其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100—121页;王日华:《先秦国家利益论及其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136—154页;王日华:《先秦时期自然状态思想与理论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7期,第77—99页;王日华、漆海霞:《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相关性统计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3—120页;陈拯:《〈盐铁论〉对外关系辩论与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研究》,《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第59—77页;陈玉聘、王欣:《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一种中国式的世界主义理念》,《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3年第12辑,第12—34页;漆海霞:《战国的终结与制衡的失效:对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反思》,《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第4—48页;朱小略:《“春秋体系”与“和同道义”》,《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4期,第1—22页;陈琪、黄宇兴:《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基于〈左传〉的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1期,第33—73页;朴柄久:《〈礼记〉的和谐世界思想》,《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第57—70页;刘伟:《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述论》,《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5期,第3—28页。

tav Acharya)看来,它们为世界提供了一系列非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世界观、国家制度与非西方文明的案例,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为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IR)提供了主要的新兴资源。^①

在第三个层面上,有学者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进行初步阐发。2008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韩昇教授提出:“研究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理论,首先就必须对中国国家形成的历史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有深入而准确的把握。”他认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有三个基础:第一,“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国家,在此过程中,更受重视的是民族的融合而不是征服。这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西方式的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反映在对外关系上,就是强调对不同民族(部族)的怀柔,而不是奴役。这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第一个基础”;第二,“中国古代特别注重通过建立文化优势来处理同周边民族(国家)的关系,……用文化优势来吸引和改造周边民族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第二个基础”;第三,“判定是否属于中国的标准,主要不是根据种族的血统的原则,而是根据文化的原则。接受并融入主流文化,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违背主流文化,便属于异族。文化的标准,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与扩大的特点,也是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第三个基础”。^②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③在韩昇看来,这一“德化”原则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最高原则。他说:“‘德化’原则决不只是一种空想,它属于一种理想主义的对外关系理论,在上千年处理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过程中,这一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各种具体的政策措施,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石。它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文明与帝国的对外关系思想,具有十分典型的中国特色。”他进而强调:“中国对外关系理论的目标不是不断地向外征服扩张,而是不断地追求扩大文明,以求达到天下一统,统一在高度的礼仪文明之上。”“这种理想主义的对外关系理论,使得其对外政策具有一种传

① Amitav Acharya, “From Heaven to Earth: ‘Cultural Idealism’ and ‘Moral Realism’ as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2, No.4, 2019, pp. 467-494.

② 韩昇:《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4—82页;另见韩昇:《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学术研究》2008年第8期,第93—107页。

③ 张燕婴译注:《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0页。

播文明的使命感,希望把中国的‘王化’像阳光雨露一般播撒于边裔”。^①在很大程度上,韩昇概括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既基于中国国家形成的独特历史进程,又基于东西方国际体系的不同逻辑。这显然主要是一种史学视角的研究结论,其研究虽没有受到国际关系学视角的影响,但也没有引起国际关系学者的共鸣,甚至鲜有国际关系学者注意到。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过程中,既在借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他山之石”攻克中国的问题,也在以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独特经验矫正或弥补西方相关理论或概念的缺失,或通过正向格义的路径,以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概念来解释中国之外的经验现象。例如,王日华用当代国际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国际体系。他根据当代国际体系的理论框架,对古代中国体系的基本单位、结构及其基本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古代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还不如说是一个体系即中国体系,这一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圈层等级制的国际体系。”但“与当代国际体系强调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核心的物质性权力不同,古代中国体系更加强调政治权威”。^②他还强调:“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的研究需要走出历史定性争议的束缚,利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作为基本框架,从而把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实践纳入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中去,推动构建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③又如,李云泉在《朝贡制度史论:一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一书中,既认为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朝贡制度研究“言之成理”,“朝贡制度确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和特征”,但也提出:“费氏大而化之的理论阐释,并非无懈可击,而他将朝贡的制度化定于明清,似欠妥当”。^④李云泉在书中全面梳理了朝贡制度的起源、发展与嬗变,并重点考察了形态最为完善的明清朝贡制度,探讨了朝贡制度的理论基础与礼仪原则,进而概括了朝贡制度的特征与功能。在他看来,朝贡制度的特征表现为:“和平主义性质”“互利性”“不平等性”“闭关自守性”。其功能则在于:“在政治上,朝贡制度除了维护贡封双方各自的利益外,它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进行安全防

① 韩昇:《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② 王日华:《古代中国体系的基本单位、结构及其特征》,《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44—57页;《道义观念与国际体系的变迁: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国际观察》2009年第1期,第54—60页。

③ 王日华:《国际体系与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第58—68页;《历史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先秦中国体系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④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御的一种手段”；“在经济上，朝贡制度充当了贸易的工具”；“在文化方面，朝贡制度是‘用夏变夷’的途径”。^① 另外，中国特有的概念和范式也被当作“他山之石”去诠释他国的问题。例如，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院邝云峰教授运用通常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相联系的朝贡制度或朝贡体系概念来阐述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② 田野、范尧天运用“礼治”这个与中国及东亚经验密切联系的概念来讨论欧洲的国际秩序。^③

信：您近年在组织中华经典国际关系研究，并已经出版了《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还即将出版《中华经典国际关系辩论》，请问您这项研究跟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是什么关系，有何特别之处？

潘：正是在上述这些开创性成果的启发之下，我们才启动了有关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和辩论的研究，以期进一步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添砖加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④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结合中国的外交实践，对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失为一条建构中国概念和理论的可行之路。《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就是这样一种尝试的成果。

在很大程度上，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和辩论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的一部分，遵从的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路径。已经出版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是由国内 20 多位学者合作完成的，选取的研究对象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历史悠久，反映中国人战略思维，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生命力，对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且在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鲜有的经典概念”，^⑤如“一”“和”“中”“势”“礼”“仁”“通”“天下”“正统”“王道”“无为”“义利”“阴阳”“纵横”“太极”“华夷”“和而不同”等。随后出版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辩论》也是一项集体成果，是前书的续篇，主要聚焦于古代中

①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14—322 页。

② 邝云峰：《美国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3 年第 4 期，第 36—88 页。

③ 田野、范尧天：《欧洲协调的礼治基础：一种正向格义的路径》，《欧洲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109—135 页。

④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 年 9 月 24 日）》，《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5 日，第 2 版。

⑤ 潘忠岐等：《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4 页。

国朝堂内外围绕治边、华夷与遣使等问题而展开的经典辩论,如天人之辩、义利之辩、合同之辩、纵横之辩、华夷之辩、王霸之辩、有为无为之辩、一多之辩、礼法之辩等。选取这些辩论的标准也是普遍具有中国特色,最能反映中国人的战略思维,能够为理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

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这项研究的特别之处在于,不纠缠于西方主流理论是否可以适用于解释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历史和思想,也不去验证哪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或辩论我们早已有之,或试图证明古代中国的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和辩论在多大程度上优于西方,而是从中国古代外交和传统文化中提炼出独有的经典概念和辩论,探讨其在特殊意义上解释当代中国的国际行为和在一般意义上解释当代世界的国家间互动关系,以及各种全球性问题方面所具有的潜在价值。^① 这项研究聚焦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和辩论虽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却并不是仅仅只能用于说明中国的对外交往行为,而且同样具有普遍意义,也可以用于解释其他国家的国际行为和互动,以及国际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和辩论研究尽管主要遵从的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路径,但同时也尽可能地关照到史学路径和经学路径,并为将几种研究路径更好地结合起来做出了初步尝试。因此,这项研究是对既有研究的补充,同时也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确立了一个新的增长点。这项研究预设的目标也较为低调,主要是通过聚焦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和辩论,发掘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思想和理论资源,以便“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铺垫”。研究的基本指向不是将东西方对立起来,而是“要让二者对话,使我们能够对国际问题有更全面和多维的视角进行观察”。^② 读者在《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每个概念研究中都能看到中西比较的部分。但该书的明显不足或缺陷在于,章节安排较为零散,不成体系。优点在于,这种特殊安排为后续的进一步研究和理论提升,特别是构建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留下了空间。

① 陈康令、潘忠岐:《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研究:指向、起点和路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8期,第20—38页。

② 潘忠岐等:《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第15、12页。

二、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与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信:您认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助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

潘:大概从 20 世纪末开始,中国学者就提出并不断致力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① 其起因当然跟中国与日俱增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直接相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固有局限相关。确切地说,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一是要为中国日新月异的对外交往提供更合理的理论支撑,二是要纠正西方视角对中国和平崛起、中西国家间互动等新的国际关系现实的错误解读。^② 而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思想资源无外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相关的概念、思想和理论。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一定会助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

中国古代外交的思想资源有助于构建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方面,发展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一定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对外关系的具体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强对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的研究,从而提炼出既能在一般意义上解释国际政治发展规律,又能在特殊意义上解释中国对外交往模式的学说。诚如倪世雄和许嘉所说,“虽然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取代国际关系的具体分析,但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仍是我国国际理论研究的指导”。^③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代领导人不仅开创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道路,而且不断通过总结和归纳,提出很多用于指导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思想和理论。毛泽东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理论、江泽民关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

① 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第 165—176 页;郭树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意识成长及中国学派前途》,《国际观察》2017 年第 1 期,第 19—39 页。

② 彭成义:《西方读懂中国“平天下”智慧与愿景的障碍及消解之道》,《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第 150—160 页。

③ 倪世雄、许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史回顾与思考》,《欧洲》1997 年第 6 期,第 11—15 页。

济新秩序的理论、胡锦涛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理论、习近平关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等，都是以五千多年的中华历史文化为基础的，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不仅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潮流，顺应了天下大势，而且凝练地表达了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的世界观和国际关系基本理念，高屋建瓴地为中国的外交实践确立了指导原则。

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灿烂的中国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天下主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多元共生、重义轻利等思想，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精髓，纵贯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对历代中国的对外交往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是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源泉，^①因此，在发展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学派过程中，需要充分挖掘并创造性地借鉴、运用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宝贵资源。之所以强调古代中国思想资源对于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是中国学者责无旁贷的重任。正如中国历代领导人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开创性地发展中国外交一样，中国学者也应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建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信：中国崛起使中国对外关系成为研究热点，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您认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是否促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中国元素的增加？随着“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您是否认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潘：在当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中国元素增加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使其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话题之一，在国际社会中有关中国的课题研究，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方方面面，包括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都受到广泛重视和追捧。特别是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以及外交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很多外交实践及其背后蕴含的思想和理念元素难以依据既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诠释，因此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对象。一方面，这在客观上使各类中国话题受到青睐，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中国学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受到重视，其影响的力度和范围均得到大幅扩展，尤其是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领域。因此，它们一并促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中国元素的增加。

^① 孙溯源、潘忠岐：《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文化的思想传统》，《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9年第25辑，第25—41页。

得益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多,传统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已经突破原有的多重障碍,既实现了对研究对象即中国的更近观察,也实现了与中国学术界研究同行的更近接触,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思想走向世界。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在各类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主题发言的机会越来越多,在海外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和在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被外界参考和引用的频次因此得到大大提高。这种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会潜移默化地扩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中国元素的显示度,在面对陌生的中国话题时,海外学者不免要借鉴一下中国学者的看法,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中国元素的增加便顺理成章。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当然,更根本的在于,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及其发挥作用的独特方式事关世界各国的切身利益,各国学者很多从维护本国利益的基本考虑出发,试图弄懂中国的外交逻辑。而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囿于其固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文化和历史偏见,很多时候难以帮助他们合理解释中国的对外行为。因此,客观上他们需要重视中国学者基于本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而自主探索出来的修正及补充西方视角的理论探索。^① 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而言,逐渐重视对中国的研究、重视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无论研究课题还是研究范式都基于服务政治的现实性目的,即同国家战略利益挂钩,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对华关系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②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本国战略利益的需要促使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包括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在海外不断受到重视,从而促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中国元素的增加,尽管这一趋势未必是很多西方学者所乐见的。

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而言,“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是个重要契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概念最早是由阿查亚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两位学者提出来的,^③并得到国内学者的积极响应。^④ 他们认为,当代国际关系学的理

① 张建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长的困惑》,《国际观察》2009年第5期,第9—16页。

② 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历史学为中心》,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2页。

③ 参见 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8, No. 4, 2014, pp. 647-659.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刘德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④ 秦亚青:《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观察》2020年第2期,第27—45页;《全球学与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4期,第92—98页。

论基础源自西方的哲学和历史文化,反映的主要是西方视角对世界的理解和诠释,因此存在过于以西方为中心的问题。而在很多非西方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中,也存在对国际关系的独特理论阐释,这些理论阐释同样值得重视和研究。其中,亚洲是当代唯一权力与财富要素双重集中的非西方地区,由于亚洲自身拥有可以与西方相媲美的悠久国际关系史,同时亚洲的国际关系史又明显不同于西方,难以简单地以西方作为参照系进行研究。因此,阿查亚和布赞认为,尤其有必要把研究的重点聚焦在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因此成为此项研究的重点对象。他们主张建立以多元普遍主义和世界历史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学,乐见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并鼓励它们与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展开对话,以超越单由西方理论主导的格局。^①阿查亚和布赞特别以亚洲地区的中国为例指出,当前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需要突破传统国际关系学的“现状国”理论范畴,并发展出中国式的理论学派来解决因中国崛起而呈现的各种理论问题。^②而这个通过创新提出有区域和国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在阿查亚和布赞看来,既符合特定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利益,也有助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和完善。

目前来看,尽管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所发展,理论的多元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提出挑战,但还不能简单地因此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正在经历由以西方为中心转向以非西方为中心,也很难说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代表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更不能夸张地断定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最终将取代西方。可以肯定的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也开始关注一些非西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同时,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学者在用外文发表文章和书籍,向世界传播非西方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因此,有不少非西方的概念和理论阐释越来越多地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同和接受,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多元化趋势已明显形成。例如,前面已经提及的秦亚青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和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和“领导力”理论。中国学者的积极参与及基于中国古代和当代对外关系的理论创新,不仅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理论研究增添了中国特色,而且大大促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①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2.

② Ibid., p. 3.

信: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注定会给当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增添中国元素,您是否认为这会对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冲击,应该怎样看待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至今,在理论层面,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冲击。给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中国元素,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势必会打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垄断。在实践层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开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既有利于提出解决各种国际问题,改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也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对外行为的理解。^①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定是对立的。中国元素的注入对西方主流理论既有挑战和冲击的一面,也有补充和完善的一面,二者更多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第一,理论一定是多元的,即使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理论之间的论争向来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动力,而不是阻力。我们知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部本来就存在着不同流派和主义之争,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等,甚至现实主义内部也存在古典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之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为世人观察和思考各种国际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等于是为本来就有的理论辩论添加了新的辩论方和辩论主题,拓展了辩论的维度与深度,并不意味着一方取代另外一方,也不意味着会形成西方与非西方的理论对抗。

第二,中国学者发展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国学派的过程,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借鉴、运用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过程,也是批判性地学习、转化和超越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甚至可以说,没有几十年来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入和学习,就不可能提出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命题。正如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那样,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也可以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注入很多西方元素。西方思想、经验与概念的注入不会阻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反之亦然。

第三,不论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尽管视角不同,内涵各具特色,但在解释当代各种国际问题的理论诉求上却是一致的。所谓中国学派

^① 林小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特色辨析》,《决策与信息》2022年第11期,第35—43页。

是指利用中国元素发展出来的具有普遍性和广泛影响力的理论范式。^①借助古代中国丰富的文化和思想资源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是中国学者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创建的国际关系理论只能用于解释中国的对外行为,也不意味着它是有国别的。就像“英国学派”并不是只能解释英国的对外行为,也不是单纯英国的理论。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没有国籍的排他性”。^②或许如杨洁勉所言:“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将会经过突出特色和淡化特色的历史过程。当中国成为全球强国的时候,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更多的普遍意义,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和接受后,成为全球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到那个时候也就没有必要突出‘中国特色’了。”^③因此,不同理论之间尽管存在特色的不同,甚至存在难以调和的学说,但它们之间本质上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只有通过相互学习和借鉴,才能不断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

三、进一步推进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的取向与路径

信:国外也有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思想与实践,您认为有哪些经验和不足?

潘:言及海外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研究,不可能不提到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及其对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的研究,^④其影响广泛且深远。就像《文史哲》杂志在2019年刊文指出:“朝贡制度理论为我们理解古代亚洲政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和视角。此后,朝贡制度逐渐成为研究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主流分析模式,长期左右欧美、日、韩学界的相关研究,并对中国学界产生重大影响。时至今日,学术界对朝贡制度的阐释、反思和批判仍在继续。”^⑤仅就21世纪以来国外学界从国际关系学视角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研究而言,也有不少成果,^⑥有些还被译为中文,跟国内学者用英文发表形成了一种有益的互动关系。

① 张旗、白云真:《中国学派的新探索与中国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构建》,《国际观察》2022年第4期,第30—58页。

②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

③ 杨洁勉:《中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强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准备》,《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8期,第149—155页。

④ 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⑤ 《〈文史哲〉国际版第5卷第2期“古代东亚秩序”内容简介》,《文史哲》2019年第6期,第169页。

⑥ 相关梳理请参见陈尚胜:《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第16—25页。

例如,受赵汀阳天下研究的影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柯岚安(William A. Callahan)教授发文讨论“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对所谓“天下制度”的可行性和应用性提出质疑,甚至批评天下思想的复兴彰显了中国企图建立世界新霸权的意图。^① 跟秦亚青用“关系”理论解释国际政治相似,宁波诺丁汉大学埃米莉安·卡瓦斯基(Emilian Kavalski)教授也用“关系”概念分析国际事务中的关系问题,尽管思路和结论并不相同。^② 江忆恩(Iain Alistair Johnston)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和大战略提出“文化现实主义”,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③ 布赞和阿查亚在《重新想象国际关系》一书中,重点考察了印度、中国和伊斯兰文明有关世界秩序的思想与实践,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如果是非西方文明首先提出“国际关系”的概念,那么,“国际关系”学可能是什么样的理论。在有关中国的一章中,他们基于中国人的天下思想和朝贡实践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可能会承认文明的同心圆”,其核心绝不会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赖以为基础的“领土”。^④ 他们的研究结论之一是,“要对国际关系去殖民化,研究非西方的历史和文化是至关重要的,而国际关系的去殖民化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关键目标”。^⑤ 此外,还有不少海外华人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备受关注,如许田波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等。^⑥

总体感觉是,尽管 21 世纪以来国外尚缺少有份量的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成果,但国外学者更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包括华人在内的海外学者普遍重视学理性研究,强调理论假设和逻辑推理的严密性,善于抓住具体的研究困惑,并选取关键要素在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建

① W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0, No.4, 2008, pp. 749-761; 柯岚安:《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0 期,第 49—56 页。

② Emilian Kavalski, “The Guanxi of Relational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 2018, pp. 233-251.

③ Iain Alistair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朱中博、郭树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④ Barry Buzan and Amitav Acharya, *Re-Imag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Orders in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Indian, Chinese, and Islamic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78.

⑤ Ibid., p. 147.

⑥ 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8 年版;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徐峰、巨桐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

立某种因果关系,且通过案例或量化统计加以验证。这种国际上通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就像阎学通所倡导的,中国学者应当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借鉴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和历史经验,创造出一些新的国际规范理论。^①或许,只有恰当利用社会科学范式对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资源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并与全球国际关系理论顺利对接。

当然,国外的研究也有需要我们引以为戒的地方,最主要的就是断章取义和用理论裁剪事实。记载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经典文献,特别是相关的核心概念,其本义跟今义可能有很大不同,很容易使读者犯望文生义的错误。如古汉语中的“国”和“家”是两个不同概念,且都与现代汉语中的“国家”概念不同。另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不少概念没有准确对应的英文,如“势”。国外学者即便能够准确理解,但在用英文发表研究成果时,也很准确表达,并因此容易形成并非出于本意的曲解。更麻烦的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历史较为复杂,既容易找到支撑某种理论假说的历史事实,也容易找到反驳的历史事实。如果从某个预设的理论出发,去解读古代中国的外交实践,那么就会很容易得出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例如,国外有学者从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出发,试图用中国明朝的对外战略作为案例验证地区大国倾向于选择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的理论假说,就使看似严谨的研究引发不少无谓的争议。^②用某种预设的理论框架去研究古代中国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得出的结论却未必能站得住脚。要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研究古代中国延续上千年的对外交往,必须借助既有的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以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成果为基础,而不是自说自话。

信: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

潘: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面临的最大难题恐怕还是研究取向的问题,是要突出中国特色还是要致力于探求普世共性,是要坚持理论创新还是要强调与既有理论接轨。尽管最佳选择不是非此即彼的二选一,但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做到有机结合、彼此兼顾。因此,与此相关的就是方法论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开拓与传承、舶来与输出的关系。另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还存在史学

^① 阎学通:《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② Wang Yuan-kang, "Managing Regional Hegemony in Historical Asia: The Case of Early Ming Chin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 2012, pp. 129-153;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视角与国际关系学视角如何相互借鉴、形成合力的问题。

特色与共性是我们面临的第一对矛盾。世界上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不同的对外关系,这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有别于中国当代对外关系和西方古代对外关系并因此形成自身特色的关键和原因,也是当今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必然要强调其特色的理由所在。但是,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外关系不论有多么不同,不论如何特殊,它们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共性。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突出自身特色,而是还要有用于今,包括有用于己和有益于他。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指向之一是要形成某种具有知识导向和能够解释现实的学理性结论,该结论理应具有一定程度的普世性,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在强调特色的同时关照到共性。特色研究和共性研究不是非此即彼的,但以特色研究否定共性研究和以共性研究否定特色研究的现象却广泛存在。这不能说不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面临的一大问题。

创新与接轨是面临的第二对矛盾。要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进行学理性的梳理和提炼,需要进行理论创新。要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经典概念和原理解释当代国际政治的一般规律,需要进行理论创新。要让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代中国的外交活动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撑,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只有持续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领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但要进行理论创新,就必须学习、消化和掌握已有理论,既不能为其所困,又能根据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独特历史对其进行扬弃、发展和超越。因此,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必须与既有理论接轨。而要使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经典概念、辩论和原理能够更好地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对接,同样需要进行理论创新。我们既不能单纯地把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和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纳入到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知识体系内进行研究,仅仅满足于国际关系理论中中国元素的增加,也不能因为对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满而要用一套完全不同的理论范式取而代之。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一个基本指向是要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让西方与非西方之间进行对话而不是对立,让我们对国际问题的观察视角更全面、更多维,让国际关系理论的覆盖面和包容度更大。

开拓与传承、舶来与输出也是我们面临的矛盾。当今的中国古代对外关

系研究即便是国际关系学视角,也决不是从零开始。大量的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既有成果为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从国际关系学视角进行系统研究和理论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代的中国学者已经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和传统文化做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① 这项探索既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开拓。同时,从国际关系学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入。我们现今使用的大量概念、理论和方法都是舶来品,如“国家”“主权”“外交”等。学术界有关先秦诸侯国是否具有主权,中国外交始于晚清还是春秋等问题的论争,盖因我们对这些舶来品的适用性有不同看法。不仅如此,我们还不确定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独特概念、思想和理论能否输出,将其用于分析和解释西方国家的对外关系,甚至成为西方的舶来品,也鲜有这方面的尝试。恐怕不处理好开拓与传承、舶来与输出的关系,就很难解决特色与共性、创新与接轨的矛盾。

另外,我们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由于存在史学视角和国际关系学视角的分野,不仅分处于不同学科,而且不是同步发展的,因此彼此之间还没有通过相互学习和借鉴,形成研究合力。如前所述,历史学(还有哲学和法学)的很多研究成果,很少受到国际关系学研究者的关注。反之亦然。有关二者的应然关系,时殷弘的分析或许最为中肯。他说:“国际关系学必须以国际关系史学作为基础和主要内容,而国际关系史学也必须以国际关系学包含的种种理论性范式、观念和命题作为一类基本工具。”在他看来,“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而言,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思考和解释有首要意义;倚重历史—哲理思考的经典方法应当是国际关系理论化的首要方法。国际关系史研究有其本身独特的重大价值,……无论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国际关系史学,都需要有广阔视野、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舍此不会有真正的历史理解”。^②

信: 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包括思想与历史,您认为是否一定要突破既有的理论框架? 在研究方法上应该注意什么?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研究路径?

潘: 鉴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存在史学路径和国际关系学路径之别,这里主要说的是后者。关于中国学者应如何用科学的方法论研究中国古代对外

^① 孙吉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话语、实践与创新》,《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8期,第8—16页。

^② 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第20—25页。

关系,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近年来国内学界已经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①但在应该如何汲取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思想资源,并使之更合理地服务于发展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方法论之争。例如,在“中国外交”的起源问题上,有人基于外交是对等独立国家间关系的定义,认为“中国外交”最早始于晚清,而古代中国没有外交的根本原因是“天下”之中没有平等关系;有人则认为,“中国外交”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主要依据是现代外交中的国家间官方行为与春秋时期的盟会政治行为有着高度的可比性;^②也有人认为,“中国外交”始于夏朝,依据在于夏朝是古代中国的早期国家,而外交作为国家的固有属性,自然是伴随早期国家一同出现的。^③我本人认为,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外交行为和思想的过程中,不能为“国家”“外交”“国际关系”等概念的当代定义所困,而应从实际出发,深入发掘那些可能对于我们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问题有帮助的概念、思想和理论。毕竟,诚如沃尔兹所说的,“国家所处的世界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为古老……在中国的战国时期或者印度的考提拉时期,各种类型的政治实体自由竞争,而其本质和行为方式的特征却没有多大变化”。^④

因此,中国学者的研究应致力于突破现有的理论框架,特别是不囿于既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体系,而是本着还原其本来面貌的原则去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中的经典概念、经典辩论和经典原理。就具体取向而言,在方法论上应强调:重“中式方法”而不是“西式框架”,重“逻辑说理”而不是“历史推论”,重“中西比较”而不是“中西对立”,重“平衡兼顾”而不是“非此即彼”,重“历史实据”而不是“道听途说”。

其中,第一条最重要。“中式方法”是说要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的问题,或者说用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研究古代中国的外交思想与实践,“西式框架”则是指用他人的知识体系来研究中国的事情。可以与之类比的是,用西医的思路研究中药,如从青蒿中提炼出青蒿素,属于典型的用“西式框架”研究中药,只有根据中医的原理,如基于青蒿的特性如何加上其他药材组建青蒿汤,

① 徐进、孙学峰:《“清华路径”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国际展望》2014年第6期,第18—32页;朱小略:《“接着讲”与范式再造: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理论困境及其出路》。

② 朱小略:《中国外交的起源问题再讨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第186—203页。

③ 参见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袁南生:《中国古代外交史》;何新华:《中国外交史:从夏自清》。

④ 转引自〔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

并在使用中依病情进行加减化裁,才是真正的以“中式方法”进行的中药研究。如果说以西医理论为指导来研究中药只会强化西医知识体系,并无助于中医知识体系,那么,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也只会强化西方理论,而无助于构建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史学路径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陈奉林教授在讨论东方外交史的学科问题时指出:“建立建设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必须从中国史学科中派生出我们自己的一套概念、理论、体系与分析模式,而不是再像以前那样过多地依赖国外研究的成果。”^①在他看来,“东方古代的国家关系不同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形成后的国际关系,西方的一套国际关系理论是无法解释历史上东方国家外交实践的,更无法给今天的东方外交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因此,“绝不能把西方的理论阐释模式强加在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上。要另辟路径,转变思路,舍西方理论的性理空谈而入东方之堂奥,这才是不二的正路”。^② 鉴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并无成熟的理论体系,中国学者在对其进行研究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能被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裹挟,不能陷入用西方理论体系研究和解读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思想与实践的误区。毕竟,“西式框架”是在研究历史上西方国家对外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以此来分析历史上东方国家的对外关系在方法论上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③ 他还强调:“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④ 要创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中国学派,就一定要形成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因此,我们在汲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和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时,必须摒弃基于“西式框架”的方法论,坚持用“中式方法”开展真正的中国研究。

后面几条比较好理解。重“逻辑说理”而不是“历史推论”,是说我们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要把重点放在对概念、辩论和原理的

① 陈奉林:《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创立与编纂实践》,《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期,第108—120页。

② 陈奉林:《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问题的再探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16—28页。

③ 转引自刘伟:《积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民日报》2022年7月19日,第11版。

④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逻辑梳理上,而不是从历史事件中推导出某些国际关系结论。重“中西比较”而不是“中西对立”,是说我们看重比较,旨在通过比较更好地梳理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独特逻辑,以便更好地进行理论建构,而不是要与西方理论分庭抗礼,更不想取而代之。重“平衡兼顾”而不是“非此即彼”,是说研究的结论应符合不走极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中国辩证法,而不是不顾历史条件的转换,得出类似于“王道”永远优于“霸道”或要么永远“王道”要么永远“霸道”的结论。重“历史实据”而不是“道听途说”,是说在使用经典文献和历史实据的过程中一定要甄别来源,既要有真凭实据,还要防止断章取义。

就研究路径而言,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第一步应聚焦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和传统文化中有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的核心要素,包括经典概念、经典辩论和经典原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所有经典概念、经典辩论和经典原理的内涵和适用性都在随着朝代更替与时世变迁而发生演变,也会因当代西方思想和理论的冲击而被重新解读,甚至误读。^①因此,需要通过哲学和历史的考察,明确这些经典概念、经典辩论和经典原理原本就有的多重内涵,并在说文解字、溯史原典、辩道论理的基础上,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进行界定。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步所做的并不是简单的历史还原,绝不是把经典概念、经典辩论和经典原理直接照抄照搬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来,而是要对它们进行理论化的梳理和提炼,使之能够更好地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对接。

因此,研究的第二步就是要探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中的相关概念、辩论和原理在当代的适用性。一方面,这项研究要通过揭示经典概念、经典辩论和经典原理背后所体现的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从古今联系的视角说明它们为什么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为什么仍然是当代中国处理国际事务和开展对外交往的精神指引;另一方面,这项研究要拿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经典概念、辩论和原理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相近的概念、辩论和原理进行比较,从中西比较的视角说明它们为什么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为什么有助于补充和完善,甚至超越,西方的既有理论。例如,中国的经典概念“势”与西方的核心概念“力”接近,但“势”不等于“力”,“势”与“力”之间存在彼此相悖或错位的情形,包括“有势无力”或“势强力弱”和“有力无势”或“力强势弱”。通过这种

^① 李扬帆:《“中华帝国”的概念及其世界秩序:被误读的天下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28—48页。

比较可以更明确地发现“势”作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所具有的独特理论价值。^①

研究的第三步是要分析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经典概念、辩论和原理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之于国家和国家间互动的意义,以及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价值。这一步最难也最为重要。例如,尽管既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中”的概念,但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却大量存在“中”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中”的三重内涵:平衡、和谐、合度,分别用以“中”字为核心的三个概念:“中道”“中和”“中庸”来表达,那么,我们可以说,“中道”是国际政治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中和”是国际稳定的基本形态;“中庸”是国际行为体相互间交往的基本原则。与此相关,“中行”则是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要求。因此,如果从“中”的视角来观察、思考和研究国际政治,那么或许能够在理论上弥补既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甚至克服其缺陷,还有助于在实践上发展新型国际关系,使之更为健全和成熟。另外,“中”的概念源于中国,“中”的思想和精神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使中国外交打上了鲜明的尚“中”特色。中国外交强调守“中道”、致“中和”、行“中庸”,因此处处体现“中”的精神。“中”因此对于中国外交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是理解中国外交不可或缺的视角。^②通过这一步的研究使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经典概念、辩论和原理能够实现中为西用、古为今用,那么,我们再思考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打造“中国学派”,就有了更可靠的根基,相应的知识体系构建也就更能有的放矢了。

① 潘忠岐:《“势”及其对于理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的独特价值》,《国际观察》2020年第1期,第69—99页。

② 潘忠岐:《中国之“中”与中国外交的尚“中”特色》,《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117—130页。